



第四辑

中国书评

CHINA BOOK REVIEW

邓正来 主编

两种现代性的故事 / 慕唯仁

从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观的转换 / 陈 贺

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 / 汪 晖

批判性反思之于学术发展的价值 / 孙 麾

建构知识扩大再生产的机制 / 徐 勇

“学术规范化”问题讨论路径的再反省 / 杨念群

如何看待知识生产者问题 / 舒国滢

博兰尼的经济人类学和市场社会观 / 王小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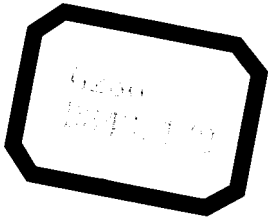
儒家哪些传统有悖法治 / 孙笑侠

在体制中拒绝主流 / 邓正来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8



第四辑

中国书评

CHINA BOOK REVIEW

邓正来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书评.第4辑/邓正来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

ISBN 7-5633-6054-9

I.中… II.邓… III.书评-中国 IV.G23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541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14 字数:200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第四辑

中国书评

CHINA BOOK REVIEW

主编

邓正来

学术委员会

邓正来 吴敬琏 江 平 王 焱 汪 晖
周国平 陈嘉映 张文显 孙立平 许纪霖
季卫东 陈平原 童世骏 夏晓虹 万俊人
何光沪 冯 象 石元康 邓晓芒 徐友渔
雷 颐 葛兆光 郑也夫 张维迎 徐显明
秦亚青 孙周兴 方流芳 秦 晖 陈弘毅
何怀宏 宋新宁 张小劲 徐 勇 赵汀阳
钱乘旦 陈 来 陈维纲 阎步克 王胜今
孙 麾 张 静 景跃进 程 农 郑 戈
赵晓力 姚建宗

学术编辑

4W 小组

学术监事

刘瑞琳

《中国书评》 CHINA BOOK REVIEW 稿约

《中国书评》是侧重学术的大型综合学术书评出版物，每季度出版一辑，为海内外知识分子评介、探讨和批评学术论著及学术思潮的自由平台。

《中国书评》的宗旨为：弘扬学术批判、提升中国学术。

《中国书评》暂定设置如下栏目：主题书评／学术书评／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学术评论／批评与回应／中文论著简介／西文论著简介／焦点讨论／书店荐书等。

《中国书评》试图成为一份具有最高学术水平的学术书评出版物，当然，这也一定是关注这份出版物和旨在提升中国学术的朋友们的期望。因此，我们诚挚地邀请学术界同人和广大的读书人与我们一道共同为《中国书评》的健康发展做出我们各自的知识贡献。

《中国书评》诚挚地向各位朋友约稿：

第一，举凡评论学术论著之人文社会科学（不包括文学作品）的论文、评介、短论或序跋，一律欢迎。

第二，稿件请直接发至 jlw2000@126.com，邓正来收；注释采用页下注，不设脚注，注释序号一律采用①②等；切勿一稿两投。

第三，大陆学者来稿一经采用即付稿酬，每千字人民币 60—100 元。

第四，来稿请附所评论著的书名、作者名、出版社、出版年代等信息。

第五，来稿请附作者个人简介。

《中国书评》
CHINA BOOK REVIEW

第四辑

目 录

直面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四大弊病

——《中国书评》(第四辑)代序/邓正来 (1)

主题书评

两种现代性的故事

——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谱系/慕唯仁 (4)

从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观的转换

——汪晖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论说/陈 赞 (27)

思想史的崛起

——读《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叶 隽 (37)

中国阐释的范式重建及其问题

——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伍 国 (49)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勘误/黄曙辉 (57)

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

——写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重印之际/汪 晖 (72)

学术书评

转型的阵痛

——重读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陈 刚 (85)

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四)

批判性反思之于学术发展的价值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例/孙 麾 (94)
- 构建知识扩大再生产的机制/徐 勇 (99)
- “学术规范化”问题讨论路径的再反省/杨念群 (104)
- 如何看待知识生产者问题/舒国滢 (115)

学术评论

虚无主义与自然正当

- 对产权改革论争的哲学评论/褚毅平 (119)

特定人物研究:博兰尼

博兰尼的经济人类学和市场社会观

- 读《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王小钢 (139)
- 概念化范式的检思与批判
- 读《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晁育虎 (150)

中文论著简介

说不可说

- 再读《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张任之 (160)
- 站在阳光的背面
- 谈权力的“波粒二象性”/李 侠 (165)
- 展读明代的社会图卷
- 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云 妍 (169)
- 钱穆与新亚书院
- 《新亚遗箴》的再解读/何方昱 (175)
- 工人政治研究的多维视角
-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述评/陈 辉 (182)

西文论著简介

直面非正义

——读史珂拉《非正义的多重面孔》/赵 波 (186)

在互动仪式中激发“情感能量”

——读《互动仪式链》/陈心想 (192)

儒家哪些传统有悖法治?

——读昂格尔的 *Passion: An Essay on Personality* 序言/孙笑侠
..... (197)

社会—法实证主义与一般法理学

——评《法律的概念》/沈映涵 (203)

波斯纳的实用主义

——评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辛 欣 (209)

序跋随笔

在体制中拒绝主流

——《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自序/邓正来 (214)

书店荐书 (218)

直面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四大弊病

——《中国书评》(第四辑)代序

邓正来*

中国社会科学在这 20 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囿于篇幅,此处不赘;当然,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考虑到我已经在其他场合或其他论著中做了专门的讨论,这里也不谈了。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有四个问题却是我不得不认真加以面对的,因为它们与我以教授的身份加入这个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社会科学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当中的四大弊病。

第一大弊病是“山头主义”。我所谓的山头主义分两类。第一类山头主义是以自然年龄而形成的山头主义。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新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讲,与中国社会科学相关的各个重要位置都已经自然而然地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所掌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位置为我们所掌控,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学术上真的就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优秀,也不意味着我们的学问也当然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好。

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我们以自然年龄而获致的利益或权力,却被刻意地转换成了一种山头主义。在这种山头主义的内部,我们虽然矛盾重重,但是我们却基本上铁板一块地排斥其他年龄段的人真正进入学术圈子和分享我们的既得利益,更不用说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了。我们根本不会想到应该邀请或推荐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参加国内或国际学术会议,充其量只是让他们

*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授,本书主编。

做会务——这已经是我们对他们很高程度的褒奖了。我们根本不会因为我们在刊物上发表了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的优秀论文而从内心中像感谢某位“知名”学者投稿一样感谢他们,因为“发表”本身已经是我们对他们的“恩赐”了。

我在90年代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的过程当中,在“六郎庄读书小组”前前后后的运作过程中,试图解决的就是这个基本问题,但是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个因自然时间而形成的利益山头的顽固性以及它对年轻人——尤其是学生——在学术发展方面的不公正。我们对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所形成的“支配”,并不全是我们因学术的努力而产生的,但是他们面对我们对他们的“支配”,却只能是恭恭敬敬。这种山头是什么样的山头呢?我认为,显然是一种在学术上绝对不平等的山头。

我所谓的第二类“山头主义”,乃是学校与学校之间、一个学校的某个科系与另一个学校的科系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派系或门户。在我看来,这种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山头主义在根本上是与学术无关的,而且还会影响和阻碍真正的学术交流。我反复强调指出,我们所在的单位或机构的级别并不能够当然地说明我们的研究水平就高,这意味着我们学校的名头、我们所在的学习单位并不能够给我们的知识和研究添加任何分数,因为知识和研究所依凭的乃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因此,我们必须铲除所有这些与学术无关的山头或山头主义。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第二个弊病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亦即一个在交流及交通方面越来越方便越快捷的时代里,我们每个人却越来越原子化,我们在知识方面越来越不交流、也变得越来越不团结。我反复讲,我们现在的学者或学生有因利益相同而交往的,有因男女关系而交往的,有因兴趣相投而交往的,有因老乡或战友或同事等关系而交往的,当然这些交往都很正常,也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方面;但是,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作为读书人——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我们却没有真正的知识上的交往,我们在知识上是不团结的。众所周知:国内的“学术”会议或国际的“学术”会议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学术交流却越来越少,其中产生的真正的学术产品也越来越少;相反,礼貌性的交往或朋友间的寒暄却充斥其间,而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主张知识上的团结。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对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不利或会对他们产生

重大影响的第三个弊病,就是读书人不读书的风气极其盛行,浮躁之风或学术消费主义取代了平实读书的风气。就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而言,这里的关键乃是这种读书人不读书的风气在教师中也颇为盛行。学生不读书吗?学生不想读书吗?按照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想读书!他们做梦都想读书!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读书呢?在很大的程度上讲,是我们当老师的给他们做出的榜样使然:不读书照样可以当教授,照样可以当博导,照样可以风风光光地出没于各种国内或国际的“学术”场合。这是一种什么风气呀?读书人怎么能够不读书呢?当我们购买某种产品而结果却购得假冒伪劣产品时,我们会说:“太缺德,连假冒伪劣产品都拿出来卖!”但是让我们摸摸自己的良心,我们作为读书人有没有读书啊?我们的职业道德何在呀?读书是读书人所呼吸的空气和所喝的水!因此,我反反复复地讲:只要我们当老师的带好了读书的头,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会把书读好的,读得甚至会比我们还好。

中国社会科学发 展过程中对学生具有不利影响的第四大弊病是我们日趋严重的狭隘的专科化趋向。这就是我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要打破各种学科障碍的原因。苏力专门做过一个统计,一个对法学论著及译著之他引率所做的分析。这样的分析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对于打破学科间的障碍来说却无甚意义。我认为,我们其实还应该做另外一个分析——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也不知道技术能不能支撑:法学界有多少篇论著被其他学科所引证?我们搞法学的人究竟对知识本身做出了什么贡献?我们在法学这个范围内所做的那些“贡献”,是不是我们这拨人自己在我们圈定的“法学”领域中所玩的游戏?在传授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需要学科化或专科化,这主要是出于便利和传承的考虑;但是我们在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说这个问题的左边是法学的、右边是经济学的、顶上是哲学的。显而易见,这个弊端对在校博士生或硕士生妥切认识和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的养成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

当然,中国社会科学发 展过程中的上述四大问题,亦即我认为对学生最不利的四大弊病,并不是很容易得到解决的。但是,我认为,通过我们一点一滴的努力,通过我们有意识地应对和纠正上述弊病,我们还是能够逐渐构建起一系列有助于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学习和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制度安排。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汪 晖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

两种现代性的故事

——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谱系

慕唯仁(Viren Murthy)*

在每一个时代,我们都要付出新的努力,以在随波逐流的势力将要吞没传统之时,将其拯救出来。^①

大约 15 年前,中国知识界陷入了一场有关中国前景、过去及其现代困境之间复杂关系的激烈争论之中,正是在这个语境之下,汪晖便作为中国最有挑战性、最富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在学界崭露头角。他的工作被认为富有争议,就是因为,在当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将现代化作为一个目标,而汪晖却始终如一地对此坚持着保留态度。他扬弃了那种对于资本主义与现代性所进行的简单的道德批判,取而代之的,他自始至终寻求通过一种细致敏锐的历史分析的方法来重新定义这场讨论当中所牵扯的一切术语,而对于读者来说,这也是他的作品富有挑战性的重要原因。也恰是出于这个目的,汪晖花了 10 多年的时间,从其作为编辑、教授以及批评家的繁忙日程当中挤出时间,完成了这样一部煌煌四卷本的作品《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在这部作品里,他从本质上重新思考了中国思想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然

* 慕唯仁:芝加哥大学博士生。

①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255.

而,汪晖的这部作品并不仅仅是历史学和史料编撰意义上的一部巨著,它也同样具有真切的政治指涉。在本书结论的最后一句话中,他写道:“……现代性充满豪情甚至傲慢地加以拒绝的历史本身蕴含着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可能性和启示。”^① 以中国作为其着眼点,汪晖着力的就是书写这样一种历史。

汪晖整合了对于西方现代性的两种不同的批评,其中之一,是延续并发展了日本历史学家沟口雄三的工作;另一种则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与后现代传统下西方批评理论家们的思想。汪晖认为,中国前现代思想中的种种转变朝向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向,并为社会主义者批评资本主义现代性创造了语境,在这一点上,汪晖延续了沟口雄三的想法。之后,汪晖便转向西方的批判理论家,他指出,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与自由主义是现代性形式的两种未加批评的表述方式,因此,便不足以批判性地抓住与新全球体系相关联的结构性的支配力量。这第二步的分析使得汪晖如同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一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社会主义中国的问题是现代性带来的问题,而非先前所认为的是传统“封建主义”残余造成的问题。在这篇文章的结束部分,我将会探讨由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框架并立而造成的一些含混,而且还要考察有关利用 20 世纪早期中国思想资源,以在现代性之外构想出路的复杂性。

汪晖的语境

汪晖在本书一开始便指出,他的目的不是在于书写一部完整的历史,而是要“通过对思想的历史解释,提供对现代问题的多重理解”^②。汪晖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本书的写作,因此,通过落实到 80 至 90 年代中国话语的转变之上,我们便能获得对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构建“诸种现代问题”的框架的体认。20 世纪 80 年代,就在中国政府推行旨在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政策后不久,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便自视为启蒙知识分子,并着力于完成国家的改革政策。而且,他们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历史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分类方法,因此,他们认为,当今的知识分子应当重拾 1919 年五四知识分子的遗产,进行封建文化的批判。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一大批知识分子在这个范式下写了许多历史著作。在这类作品中,晚清知识分子被视为是不彻底的现代化倡导者,因为他们仍然保留着传统思想的因素;而相应的,更为西化的五四知识分子由于能够更为彻底地与传统决裂,因而便成

①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页 1492。

②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页 3。

为了褒扬的对象。

但是,在中国社会从以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转型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际,新一代年轻的批判知识分子也开始出现。很明显,这种社会转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然而,中国政府是在1991年之后才标志性地开始私有化进程的^①。这个进程也伴随着知识领域的逐渐专业化,因此,这也加深了中国知识界与西方学院之间的互动程度。中国学者翻译了一大批西方学术著作,内容涉及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多种类型的自由主义,同时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们前往美国继续他们的学习或研究,但是,在他们在外求学期间,耳闻目睹的美国政治令他们原先的幻想破灭,于是又作为批判的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了中国。汪晖虽然并没有留学的背景,但是他的思想轨迹也表现了那种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知识变迁。这是由于他本人也是那一代中国年轻学者中间的一员,他们这批人,在80年代自由主义流行中国时接受教育,而在90年代又逐渐转变成为了现代性的批判者。

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使得知识分子们开始在与现代性的关系当中重新估价中国文化。简单地讲,20世纪80年代,前市场的知识分子已经将1919年五四启蒙运动看作是一条通往市场化的道路。因此,他们吁求一种更为“保守的”发展途径,即强调市场改革而非政治改革^②。由此,中国传统思想也被重新解释为一种能够与资本主义和人权并存的资源。

上述一系列社会与知识界的变革使得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如果要理解“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则应当将其放置于一个与国家有关的语境下,而非从一个文化的角度上去理解。譬如说,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讨论中国“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文章里,绪形康(Ogata Ko)这位支持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日本人提出,保守与激进这两个词在美国与中国的含义是完全相背的。在美国,人们将新自由主义者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与哈耶克(Frederick von Hayek)所分别持有的自由与小政府的哲学视为保守主义,而将更趋向于社会民主理论的罗尔斯(John Rawls)视为激进主义。绪形康认为,在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小政府的观点是激进的,这是由于他们反对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而诸如汪晖这类所谓的“新左派”们,由于重新强调国家意识形态,而应被视为是保守派。^③在这种阐释下,中国对于资本主义的种种批评,事实上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原因在于他们支持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

① 对于20世纪90年代新知识环境出现的全面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汪晖本人就此问题曾有过一篇讨论文章,现已有英文版。参见《中国的新秩序:转型中的社会、政治与经济》,胡志德(Ted Huter)主编(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同时也可参见胡志德为此书所写的导言,以及博士卓(Joseph Fewsmith)所著的《天安门之后的中国:转型的政治》(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② Joel Thoraval, *Conscience Historique et imaginaire sociale*, *Espirit*, 302卷, 2004年, 页174。

③ Ogata Ko,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21世纪中国》(China 21), 第29卷, 页88。

现存的政治结构。

汪晖的许多辩论就是针对中国当下知识界里两派——他更愿意将这两派知识分子称为新自由主义者与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争论的这一理解方式而发的。正是处于这场争论的语境下,汪晖援引西方批评理论并断定,中国社会主义的问题事实上是现代性的问题,同时也是更大范围内全球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用汪晖的话来说,中国社会主义是“反现代的现代性”,而且“不仅仅是中国思想家的特殊表现方式,还是现代性内部一种结构性对抗的反映”^①。因此,汪晖强调,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西方的分类方法强搬硬套到中国,并就此作出结论,认为中国的批判性知识分子是一味支持国家权力的。

除此之外,许多属于所谓新左派的知识分子由于支持五四运动与共产党而遭到来自自由主义者的挑战。汪晖对此的应对方式非常独特,他将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政治—经济的激进主义态度同那种对于中国传统的深切的敏感性联系了起来。因此,在新自由主义扩张与启蒙主义批评的双重压力下,汪晖所作的努力可以被视为是拯救中国思想于两者夹缝之间的行动,同时,他的努力也表明了,中国传统思想为对抗现代的现代性(或者说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的基本主题

汪晖此书的内容极为详尽,在此,我只是就一些有关的具体问题,做提纲挈领式的叙述。本书分为上下两卷,每卷又分为一二两部,一共煌煌四卷本。上卷第一部题为:《理与物》,旨在讨论随着宋代“天理”观的建立而产生的分裂。上卷第二部的内容相对更为政治性,集中讨论了中国在17世纪至20世纪期间由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特别讨论了中央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转变。在下卷第一部里,汪晖继续讨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由帝国走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在清朝(1644—1911)晚期,知识分子们如何继承了宋朝(960—1120)天理观的问题。下卷的第二部集中分析了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间有关现代科学的讨论,并将这些讨论背后所秉承的基本框架同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扩张联系了起来。在结论部分中,汪晖更深入地考察了与其书中所涉及的有关要点相联系的当代理论问题,也特别地讨论了在现存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的争论相关的科学与科学主义的观点。

^① 《关于现代性的对话》,引自傅士卓著:《天安门之后的中国》,页118。

宋朝的现代性

接下来,我将重点讨论第三卷的内容。在第三卷里,汪晖表明了宋朝的转型为晚清知识分子对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态度创造了条件,也正是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汪晖一系列论证的相关性。但首先,我们必须简单地探究一下宋朝所发生的这场为后来的思想奠定基础的转型所蕴含的本质。在汪晖看来,从战国时期(前 475—前 221)一直到宋代,儒家思想不是建立在一种超越的宇宙观之上。换句话说,孔子及后来的追随者们都希望采用恢复三代(前 1700—前 221)之制的理想方式来应对现实世界中礼崩乐坏的状况。相对来说,我们对于三代的情况知之甚少,但由于周代一直持续到战国末年,即公元前 221 年,因此,早期儒家便对于三代这些理想化的朝代有一种强烈的连续性认同。在早期儒家看来,三代的礼乐充分体现了天/自然的宇宙理想,并且礼乐与理想政治体制之间是不分离的。

三代的系统包含一些具体的特征,譬如,分封而治的政府体系,这被称为“封建”,有时也翻译成“封建主义”^①。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中国,建立了一个更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之后,文人们意识到,他们已不能简单地回到三代那种政治秩序中去了。甚至,在汪晖看来,从公元前 221 年一直到宋朝,统治者们逐渐加强了政治结构的中央集权,因此,距离去中心的那种封建式的三代理想政治架构也就越来越远了。而到了宋朝,由于建立了所谓“郡县国家”,这种过程也随之达到了顶峰。

汪晖主张将这些社会变革视为是现代出现之前的预兆,同时,他也讨论到,宋朝的儒家思想发展了“天理”的概念,用以应对这些社会变革所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在书中,汪晖这样说道:“如果上述被归纳在宋代社会特征之下的要素——中央集权、市场经济、长途贸易、‘国民主义’或‘准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等等——可以被归结为某种‘早期现代性’的话,那么以天理为中心的儒学思潮的政治内涵或社会内涵就可以被概括为针对这些所谓的‘早期现代性’因素的批判理论。”^②

所谓“天理”的概念实际上非常难以定义,但是,在书中汪晖对其有一个粗略的注解。

天理概念的确立标志着伦理道德必须以一种先验的理为根据和标准……不是具体

① 有些人认为,不能用“封建主义”来概括早期中国,而这种声音现在也越来越强。李锋有一篇文章,详细讨论了在中国不适宜套用“封建主义”这一术语的问题,参见《“封建主义”与中国西周:一种批评》,《哈佛亚洲研究学刊》,第 63 卷,2003 年。

②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页 110。

的制度、礼仪和伦理,而是抽象而遍在的“理”,构成了道德的源泉和最高的标准。^①

汪晖认为,由于在已有的,具体地说,就是在任何过去或当下存在的历史体系与应有的理想体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至有宋为止,思想方面的变化呈现出一种类似现代性转向的面貌。正如统治者从地方抽象出政治权力,并将这种权力集中到汪晖所说的“前民族国家”之中一样,儒家学者们也将道德基础从所有特定的政治体系中间抽离出来,并将此种基础放置在天理之下。这就为文人们创造性地解释儒家经典开辟了空间。

汪晖注意到,除了解决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之外,“天理”同时还起着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在这种断裂之后重建延续性。换句话说,宋朝的儒家学者们同时肩负着两项完全矛盾的使命:一方面,他们需要为宋朝内部统治基础架构,也就是所谓的郡县国家的体制建立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对于这种体制的某些方面,他们仍然还是表达了某些批评的意见。作为儒家学者的宋朝文人仍然将三代作为一种理想,但他们必须将这种对于过去的理想同现实社会中一系列复杂的转型相妥协。他们整合了天理观与“时势”概念,由此便可以既建立同过去的连续性,又能够为现实社会政治架构提供合法性。

汪晖这样解释“时势”概念:“首先,时势概念将历史及其变化纳入自然的范畴,解构了天命对人世的决定关系,为主体的历史行动提供了空间。”^②在此,作者指出了儒家知识分子所采用的“时势”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与黑格尔哲学的一些基本点息息相通。“正像黑格尔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视为历史演变的一样,柳宗元^③将分封制与郡县制视为历史变迁的内在结果。”^④在柳宗元看来,从地方分权到中央集权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化过程”^⑤。汪晖同时还指出,柳宗元与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在于,柳宗元的时势概念不需要诉诸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而更多的是建立在由《周易》、《庄子》所奠定,由郭象^⑥所阐释的那种“自生”的历史之上。根据这种宇宙观,中央集权体制便没有那种永恒的合理性,因此,人们也需要认识到,中央集权的政府仅仅是特定历史时势的产物,它们不能满足条件而成为目的论历史观的计划或目标。

根据时势的观念,宋儒们认为,三代礼乐的理想甚至包括封建的理想,都不能为任何一个具体政治体系提供合法性,这些政治理想能够在当时发挥作用,就是因为它们能够顺应天

①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页209。

② 同上书,页58。

③ 柳宗元,唐代(618—907)思想家,他拓展了时势概念的外延。

④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页57。

⑤ 同上书,页57。

⑥ 郭象为魏晋时期思想家,其《庄子注》为相对较为重要的一个注本。